

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双重认同研究^{*}

张 陆

摘要: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编制《城乡双重认同量表》,对237名青年城市移民进行问卷调查,从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两方面考察青年城市移民社会认同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青年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且高于城市认同;(2)青年城市移民的社会认同模式主要是分离型和边缘型;(3)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水平及模式在户口类型、职业、收入、生活地预期、进城时长、家人陪伴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青年城市移民 城乡双重认同 白领 蓝领

一、社会认同与社会认同理论

(一)社会认同及其心理结构

社会认同,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作为过程,它是一个具有边界的求同存异的过程,在边界内个体遵从群体的规范、内化群体的价值,此为求同;在边界外则表现出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此为存异。作为结果,它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同中包含了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觉知,以及对该群体所共享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的内化,是一种认知结构(叶娜,2009:4-7)。

在群体行为研究中,社会认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仅是由于各种理论的发展,同时还归功于对社会认同的操作化的科学性,即对于社会认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的认识。对于社会认同心理结构的科学探索和有效测量是开展社会认同研究的方法学基础。

有研究者将社会认同看作是一个单维度的结构,并用单一指标来进行测量(Hutchison et al., 2008:874-881)。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从多个维度来测量社会认同更加有效。泰费尔(Henri Tajfel)对社会认同的概念界定广受认可,他认为社会认同是“组成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自于个体对于其群体身份的认识以及与此身份相联系的价值和情感意义”(转引自Cameron, 2004:240)。由此概念可以推出社会认同的三个维度——认知(对成员身份的意识)、评价(群体价值的判断)和情感(归属感等情感卷入)。有研究者通过经验研究得到类似的三维度结构,支持了该结构的合理性。杰克逊(Jackson, 2002:11-33)在研究中通过量表考察被试对赋予性群体(如族群)、选择性群体(如职业群体)和面对面群体(如朋友群体)三大类群体的社会认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了认知、评价和情感联系的三维度结构。卡梅隆(Cameron, 2004:239-262)在研究中分别测量了被试对大学生群体、性别群体和国家的社会认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社会认同的三个成分:即认知中心性,是指个体认真思考自己的群体成员资格;内群体情感,是指个体体验到与群体成员资格相关的正面的情感体验;内群体联结,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跟其他内群体成员之间具有相似性、相关性和归属感。叶娜(2009:32-53)在研究中考察了被试对大学生、性别、国民和籍贯四个群体的社会认同,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提出身份性(个体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以及群际间的差别,并且此群体身份是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评性(个体知觉到的外群体对本群体的评价)和归属感(能够在内群体中体验到快乐、幸福和感受到紧密的联系)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19003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1RW042)资助。感谢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华枝、白嫻、皮优悦在本研究数据收集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的三维结构。

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在解释认同维度的时候应该赋予更多的涵义。利驰等人在以往有关群体认同概念和测量的研究基础上,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提出了二层次五维度模型(Leach et al., 2008:144-165)。五个维度分别为,个体自我刻板化(individual self-stereotyping,个体感知到自己与群体原型相似)、内群体同质性(in-group homogeneity,个体将内群体成员知觉为拥有共性的)、满足感(satisfaction,内群体带给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团结感(solidarity,是指个体对内群体的心理联结与承诺)和中心性(centrality,是指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性和凸显性);五个维度又分属于两个二级因素,前两个维度被归类为“群体水平的自我界定”,后三个维度被归类为“群体水平的自我投入”。

(二) 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

泰费尔和他的学生特纳(John Turner)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是当前最具有影响力的解释社会认同的理论体系之一。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需要通过社会分类来建构自我概念,个体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类别,因此个体拥有一系列的群体身份,这些群体身份以社会认同的形式表征于人们的认知结构中,并且它们对自我概念的重要性是不断变化,不同的情境中凸显不同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通过分类(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社会比较(comparison)三个过程建立起来的(赵志裕等,2005:202-223)。通过社会分类,人们进行不同群体的区分,并将自己纳入某一群体中,获得该群体的典型特征。由于社会认同的多重性,情境在社会分类的标准中起到关键作用,例如一名男大学生,当他与其他男中学生在一起时,他更可能按照学历来进行群体的区分,当他与其他女大学生一起时,他更可能以性别为群体的区分标准。在进行分类认同之后,个体便会将自己所属群体与外群体进行对比,社会比较遵循积极区分原则,个体希望在社会比较中获胜,从而提升自尊。在泰费尔等人看来,通过社会比较提升自尊是个体获得社会认同的动机所在(张莹瑞、佐斌,2006:475-480)。如果无法通过社会比较来提高自尊,个体则可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维持社会认同。这些策略包括个体流动(individual mobility)、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和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个体流动是一种个人策略,是指个体试图脱离原有群体而进入地位较高的群体;社会创造则是群体成员通过改变比较维度或情境等,来寻求积极区别;社会竞争是指群体成员通过如革命、示威等竞争方式来寻求积极认同,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都是集体策略(王沛、刘峰,2007:822-827)。

特纳等人(2011:44-69)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我分类理论,该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不同,它的焦点并非群际比较,而是分类过程。特纳认为,人们会对人或事物进行自动分类,并在对他人的分类中自动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当个体将自己或他人分类到特定群体后,便向群体的原型(prototype)接近,他们会更多地表现出原型的特征而非个体特征,这便是自我分类的核心认知过程——去个性化(depersionalization)。与社会认同理论相同,自我分类理论也认为个体拥有多重认同,个体认为他们属于多少种群体就会有多种社会认同(李春、宫秀丽,2006:157-160)。这些认同中的哪一种会被激活主要受到两种因素影响,一是分类的可及性,即某类别在特定情境中可以被提取的容易程度,人们经常使用的类别往往是可及性高的类别,也是与个体自我概念关联紧密的类别;二是个体与原型的契合度,个体与某群体原型的相似性越强,该社会认同也越容易被激活(赵志裕等,2005:202-223)。关于社会认同的动机,自我分类理论除了认可自尊的重要性,还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动机:人们希望通过社会认同清楚自己是谁,自己所属群体成员是怎样的,其他群体成员有哪些特征,有了这些知识,人们便可以感知或预测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感(李春、宫秀丽,2006:159)。

(三) 多重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都认为个体可以从属于多种群体,因此会拥有不同的社会认同。罗卡斯和布鲁威尔在分析社会认同复杂性时指出,当两个群体是独立的且无法交叉,并且这两个群体对个体的社会认同都至关重要时,多重社会认同便会出现。由于社会认同的激活依赖于情境,因此在不同的情境中,适合于该情境的社会认同便会被首先激活而发生作用(Roccas & Brewer, 2002: 90 - 91)。例如,女性律师在工作中首先激活的是律师认同,在家里则首先激活的是性别认同。

多重认同尤其是双文化认同在移民研究中受到格外关注。沃德等人(Ward & Rana-Deuba, 1999: 428)提出“文化融入指数”这一指标来测量移民的双文化认同,该指数包括两个分指标,一是个体对移居地文化的认同程度,另一是对原居地文化的认同程度,根据二者得分高低,可以组合成四种双文化认同类型:整合型(高移居地认同、高原居地认同)、分离型(低移居地认同、高原居地认同)、同化型(高移居地认同、低原居地认同)和边缘型(低移居地认同、低原居地认同);研究表明整合型认同者有更低的抑郁心情,而同化型认同者则有更少的社会适应困难(如与当地交友、听懂方言等适应问题)。

二、我国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研究

城市移民通常被认为包括三种类型——体力、脑力和投资移民(宋林飞, 2005: 6),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移民的随迁子女。蓝领、白领和随迁子女的社会认同是我国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

关于城市移民的社会认同的心理结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夏四平(2008: 20)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三个维度,分别是觉察自己身份的归属认同、对群体有情感卷入的归属情感和对该群体社会价值的归属评价。蔡贞等人(2012: 78 - 81)探讨了农民工对农民身份的认同结构,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三个维度,分别是自我归类、身份重要性和行为投入。自我分类指农民工将自己划分为农民群体的心理倾向,身份重要性反映了农民工对农民身份的关注和及其重要性,行为投入反映了农民工参与农民活动的倾向性。郭星华和邢朝国(2009a: 54 - 60)则从个体 - 群体关系的视角将社会认同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对社会群体的认知和评价,二是对自己与该群体关系的认知和评价,并根据二维度的高低组合,表现出四种认同类型:积极性的社会认同(两种认同均是积极的,使得个体完成社会融入)、消极性的社会认同(两种认同均是消极的,使得个体产生失望或偏见)、矛盾性社会认同 I (对群体认同积极、对关系认同消极,使得个体改变自身或退回到原群体认同)和矛盾性社会认同 II (对群体认同消极、对关系认同积极,使得个体脱离当前群体或维持现状)。

对于城市移民社会认同的状况,王春光(2001: 63 - 76)的调查发现,78.5%的青年农民工认同农民身份,4%的说不清,10.9%的不认同农民身份。彭远春(2007: 85)的研究则发现 18.6%的农民工不认同农民身份,35.3%的认同模糊,46.1%的明确认同农民身份。在蔡禾和曹志刚(2009: 148 - 158)的调查中,72.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其余的认为自己“不是农民”;将近一半的农民工对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是正面的。郭星华和李飞(2009: 78)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双重性,既对北京持有城市认同,又对家乡持有农村认同,农民工的农村认同较城市认同稍强一些;有 56.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21.1%的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3.1%的将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另有 18.9%的农民工认同模糊。

雷开春(2008: 74)考察了上海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状况,发现他们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不高(2.5%),最多认同的是“外地人”(47.7%),其次是“新上海人”(21.3%)和“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21%)。郭星华和邢朝国(2009b: 103 - 108)调查了北京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北漂)的社会认同状况,56.4%的北漂认为自己不是北京市一员,有 22.2%感觉说不清,

超过半数的人(55.2%)在北京没有家的感觉,这表明北漂对北京市的归属感并不强烈;北漂与北京人交往的比例比较高,但是深度交往则不多,他们有着比较强的与北京人交流的动机;他们感觉自己与北京市民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为人处世方式和生活习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上述两研究中,研究者并未区分新移民的籍贯,他们融入上海和北京两城市的状况已是不容乐观。

石长慧(2010:2-12)对初中流动少年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流动少年认为自己是农村人,把自己归到农村人的群体中,他们作此分类的标准是依据户口为农业户口,即在制度上,他们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然而在文化上,很多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少年在文化上已经是被同化的城市人;流动少年对农村和农村人的评价要比城市和城市人的评价更积极。袁晓娇等人(2010:37-45)对小学初中阶段流动少年儿童的调查发现,流动儿童对城市的认同要高于对老家的认同,研究者根据他们对城市和老家认同的得分高低区分为四种认同类型,即整合(高城市高老家,19.7%)、同化(高城市低老家,33.2%)、分离(低城市高老家,30.5%)和边缘化(低城市低老家,16.6%);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及模式在性别、家庭经济地位、来京时间和教育安置方式等因素上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农民工与流动儿童少年从农村来到城市后,由于文化改变甚至文化冲突,使得他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适应性的社会认同问题。而白领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则还未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就已有的白领新移民研究结果可以推断他们的城市适应状况也应不容乐观。有研究指出,多重认同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由于多重认同能够给予个体更多的生存价值和行为指导,能够使个体更轻松地应对情境问题,同时多重认同与高的自尊和自主感相关(吴小勇等,2008:10)。当前我国研究城市移民的多重认同问题还较少,仅有袁晓娇等人(2010:37-45)对流动青少年的城市和老家认同的研究。本研究将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利用心理测量的手段来探讨白领和蓝领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双重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被试

本次调查在武汉和天津通过“滚雪球”方法搜集样本,样本中包括白领和蓝领两大职业群体,本次调查的样本有以下特征:(1) 出生户口为农业户口(当前户口类型农业或非农均可);(2) 在城市中生活了至少1年时间;(3) 当前仍主要在城市工作生活;(4) 年龄为16-40岁之间。基于以上界定选择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62份,获得有效问卷237份;其中男性117人,女性120人;白领101人(私营企业主4人、管理人员32人、专业技术人员26人、普通白领39人),蓝领136人(生产工人126人、服务业8人、运输业1人、个体1人);已婚95人,未婚136人,离异6人;当前为农业户口171人,非农户口66人;平均年龄25.51岁,标准差3.80岁;在城市生活的平均时间为5.92年,标准差为4.83年。

(二) 研究工具

1. 城乡认同量表

研究者编制了《城乡认同量表》,该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即《城市认同量表》和《农村认同量表》,两个量表结构和项目均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所指对象群体不同,《城市认同量表》所指对象群体为“城市人”,而《农村认同量表》所指对象为“农村人”。量表的编制基于叶娜(2009)研究中所发现的社会认同的三维度结构,即身份性、评价性和归属感;身份性是指农村人或城市人角色在个体自我概念中的卷入程度;评价性是指个体认为农村人或城市人群体在其他外群体中的评价如何;归属感是指与农村人或城市人交往所带给个体的愉悦感。初始量表中每个维度利用5个项目测量,并采用里克特6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对该群体的认同度越高。

在预测中,以 171 名农村生源大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 98 人,女生 73 人;大一 4 人,大二 61 人,大三 16 人,大四 90 人;农业户口的 103 人,非农户口(包括户口转入学校)的 68 人;平均年龄为 22.15 岁,城市生活平均时间为 5.02 年。

利用预测数据,分别对《农村认同量表》和《城市认同量表》的项目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抽取三个因子,逐步剔除双重负荷以及不易解释的项目,并保持两个分量表项目的一致。最终保留 11 个项目,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身份性	归属感	评价性
我是农村人/城市人这想法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	.845(.801)	.109(.124)	.021(.239)
我的思维和行为是农村人/城市人的方式	.834(.648)	.066(.352)	.114(.072)
在很多场合我都会清楚的意识到我是个农村人/城市人	.832(.841)	.116(.210)	.008(.146)
农村人/城市人这一角色对于我认识自己很重要	.498(.786)	.350(.333)	.223(.049)
和农村人/城市人聊天时我很愉快	.096(.283)	.837(.679)	.140(.166)
我的朋友中有很多是农村人/城市人	-.020(.322)	.789(.579)	.088(.146)
我喜欢和农村人/城市人交往	.153(.118)	.727(.724)	.173(.280)
我的想法和观点能得到农村人/城市人的理解和支持	.287(.240)	.648(.814)	-.058(.079)
很多城里人想成为农村人/城市人	.240(.070)	-.032(.123)	.785(.796)
城里人会羡慕农村人/城市人	.028(.209)	.072(.156)	.648(.792)
很多人喜欢农村人/城市人	-.037(.108)	.216(.210)	.634(.793)

注:括号内为《城市认同量表》分析结果

在正式调查中,《城市认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农村认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不论是农村认同或是城市认同,三因子模型均拟合良好,且都好于单因子模型。因此,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 2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卡方	自由度	卡方/自由度	近似误差均方根	比较拟合指数	非范拟合指数	增量拟合指数
农村认同	M1	268.05	39	6.87	0.17	0.78	0.69	0.78
	M3	119.42	41	2.91	0.09	0.92	0.90	0.92
城市认同	M1	188.50	39	4.83	0.13	0.88	0.83	0.88
	M3	101.64	41	2.48	0.08	0.95	0.93	0.95

注:M1 为单因子模型,M3 为三因子模型。

2. 相关变量

问卷还询问了被试的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和收入情况,以及被试在城市生活的相关状况,包括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有几年、家庭成员一起在城市生活的情况、是否享有城市福利,未来打算在哪里生活、当前生活满意度等。其中,年龄、城市中生活时间为以年为单位的测量型数据。相关变量中的类别和等级变量及选项如表 3 所示。

表 3 类别变量及选项情况

类别变量	选项
性别	1 = 男, 2 = 女
婚姻状况 ^①	1 = 已婚, 2 = 未婚, 3 = 离异, 4 = 丧偶
收入 ^②	1 = 1500 以下, 2 = 1500 - 3000, 3 = 3000 - 5000, 4 = 5000 以上
户口状况	1 = 农业户口, 2 = 农业户口转非农户口
家庭成员一起在本市生活情况	1 = 自己一个人, 2 = 部分家庭成员一起, 3 = 全部家庭成员一起
是否享有城市福利	1 = 是, 2 = 否
未来打算在哪里生活	1 = 城市, 2 = 农村, 3 = 说不清
职业类型	1 = 蓝领, 2 = 白领

四、结果与讨论

(一) 农村认同与城市认同结果分析

1. 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的基本情况

计算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各维度及总体的项目均分, 比较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各维度及总体项目均值与中间分之间是否有差异, 高于中间分表明认可该身份认同, 低于表明不认可该身份, 等于则表明对该身份的认同水平一般。本次测量采用 1 到 6 点计分, 因此中间分为 3.5。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总体上看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 而城市认同则较低。(见表 4)

表 4 城乡认同各维度和总分的项目均值及 t 检验结果

	均值	标准差	t^a		均值	标准差	t^a	t^b
农村身份性	3.23	1.06	-3.92 ***	城市身份性	2.93	0.85	-10.44 ***	3.62 ***
农村归属感	4.29	1.01	12.09 ***	城市归属感	3.30	0.87	-3.57 ***	11.37 ***
农村评价性	3.00	1.07	-7.21 ***	城市评价性	3.51	1.14	-0.14	-4.57 ***
农村认同	3.55	0.77	1.06	城市认同	3.22	0.75	-5.71 ***	4.84 ***

注: a 与 3.5 比较的单样本 t 检验; b 农村认同与城市认同做比较的配对样本 t 检验;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对各维度的结果分析发现, 提高自尊可能并非城市移民城乡认同的最重要动机。城市移民感知到的农村人的社会评价低于城市人, 也就是说农村人群体在与城市人群体的社会比较中处于劣势,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自尊假设, 城市移民若要寻求积极的自我评价, 他们应该更加认同城市人群体, 然而结果则恰恰相反。他们的自我概念中“农村人”比“城市人”更加重要, 而且他们喜欢与农村人交往而不太愿意与城市人交往(见表 4)。在豪格(Hogg, 2000: 223 - 255)看来, 减少主观不确定性、建构一个可预测的有意义世界, 可能是比提高自尊更加重要的社会认同动机。农村居民来到城市后, 由于他们语言、穿着、居住、行为方式、工作类型等与城市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此他们更加明确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外界的不同, 农村人认同被频繁激活而成为他们界定自我的核心社会认

① 由于被试中离异的人太少, 只有 6 人, 因此结果中进行差异分析时只做了已婚和未婚的对比。

② 收入的四个层次中 1500 元以下和 5000 元以上的人数很少, 分别为 12 人和 15 人, 因此结果分析中对收入等级进行了重新划分, 分为 3000 元以下和 3000 元以上, 分别为 178 人和 59 人。

同。在城市这个新环境中,“农村人”——更确切说是“城市中的农村人”——认同能够给城市移民带来更多自我概念的确切性,使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而能够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此外,城市移民往往会遇到种种城市人的歧视,这又使得他们需要通过提高内群体认同来对应与歧视有关的伤害(范兴华等,2012:658)。因此,尽管城市移民感知到农村人的社会评价不如城市人,但他们还是更加认同农村人。

2. 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的差异分析

分别以性别、婚姻状况、户口情况和职业类型为分类标准,对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的差异性做比较分析。经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已婚城市移民农村认同水平较未婚高。城市移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在婚姻选择中绝大多数仍然会选择农村人尤其是“老乡”为配偶(周伟文、侯建华,2010),这种选择既是他们身份认同的结果,又会加强他们与农村人的联结,从而增强他们的农村认同。毫无意外,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差异的重要制度原因,因此不同户口之间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存在显著差异,取得了非农业户口的城市移民,他们的城市认同更高而农村认同更低。

白领和蓝领之间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为户口状况的差异,蓝领中仅有约4%的农转非户口,而白领中农转非户口的比例约60%。剔除非农户口被试后,重新比较白领和蓝领的城市和农村认同状况,结果发现白领仍较蓝领有更高的城市认同($M_{\text{白领}} = 3.26, M_{\text{蓝领}} = 3.05, t_{(111.45)} = -1.91, p = 0.058$)和更低的农村认同($M_{\text{白领}} = 3.27, M_{\text{蓝领}} = 3.87, t_{(169)} = 4.56, p < 0.001$)。袁晓娇等人(2009:25-32)的研究发现,由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有更多机会与北京儿童和北京文化接触,并且没有打工子女学校儿童的污名标签,所以他们有更高的北京认同和更低的老家认同。因此,除户口因素之外,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群体由于工作环境更加接近于城市人,与城市人接触交往的机会更多,工作方式更加城市化,使得他们拥有较蓝领更高的城市认同和更低的农村认同。

表5 城乡认同差异分析结果

		农村认同			城市认同		
		均值	标准差	t	均值	标准差	t
婚姻状况	已婚	3.71	0.68	3.16**	3.19	0.90	-0.55
	未婚	3.40	0.80		3.25	0.65	
户口情况	农业户口	3.73	0.76	6.68***	3.10	0.79	-4.82***
	农转非	3.10	0.60		3.53	0.54	
职业类型	蓝领	3.86	0.68	7.98***	3.04	0.85	-4.83***
	白领	3.14	0.69		3.47	0.52	

为了探明白领和蓝领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程度,分别将蓝领和白领的农村认同、城市认同得分与3.5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蓝领移民的农村认同较高($t_{(135)} = 6.15, p < 0.001$),城市认同较低($t_{(135)} = -6.39, p < 0.001$);而白领移民的农村认同较低($t_{(100)} = -5.22, p < 0.001$),城市认同处于中等水平($t_{(100)} = -0.63, p = 0.53$)。

3. 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为因变量,以生活满意度、收入、城市生活时间、家庭成员一起在城市生活情况、是否享有城市福利和未来规划为自变量,运用层级回归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层级回归第一层次中放入收入、是否享受城市福利两个二分变量,以及城市中生活时间一个连续变量,采用 Stepwise 筛选进入方程变量;第二、三层次中分别放入“家人在城市生活情况”和“未来打算生活在哪里”的两个类别变量所转换的两组虚拟变量,采用 Enter 法进入方程。层级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 6 城乡认同对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农村认同			城市认同		
	一般回归	标准误	标准回归	一般回归	标准误	标准回归
3000 元以上	-0.31	0.12	-0.18 **	0.36	0.11	0.21 **
全部家人在本市	0.35	0.15	0.17 *	0.28	0.14	0.14 *
部分家人在本市	0.13	0.11	0.09	-0.01	0.10	-0.01
未来回农村	0.30	0.13	0.19 *	-0.32	0.13	-0.20 *
未来不确定	0.30	0.13	0.19 *	-0.46	0.12	-0.30 ***
	$R^2 = 0.10, F(7, 229) = 4.67^{***}$			$R^2 = 0.14, F(5, 231) = 8.90^{***}$		

注：“全部家人在本市”和“部分家人在本市”的参照类为“独自一人在本市”；“未来回农村”和“未来不确定”的参照类为“未来留在城市”

社会认同是建构自我概念的途径,而自我概念的重要作用便是对自己行为的统一和预测,那些确定自己未来将会在城市生活的人,他们有着明确的城市自我定位,因此他们也有着明确的城市身份认同,因此他们的城市认同得分较高,而农村认同得分较低。全部家人都在一起生活,使得个人不论是生活习惯还是语言等生活环境与之前的农村生活有着更多的联系,他们的自我建构也与农村身份有着更多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农村认同得分更高;与此同时,家人的存在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生活,从而能够更好地获得城市认同。此外,收入的提高会使得城市认同增长而农村认同降低。

(二)城乡双重认同结果分析

表 7 不同特征城市移民的城乡双重认同模式分布情况

		整合		同化		分离		边缘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总体		49	20.7	43	18.1	74	31.2	71	30.0
婚姻状况	已婚	26	27.4	8	8.4	34	35.8	27	28.4
	未婚	23	16.9	35	25.7	34	25.0	44	32.4
户口状况	农业户口	41	24.0	14	8.2	67	39.2	49	28.7
	农转非	8	12.1	29	43.9	7	10.6	22	33.3
职业类型	蓝领	32	23.5	7	5.1	65	47.8	32	23.5
	白领	17	16.8	36	35.6	9	8.9	39	38.6
家人居住	独自一人	13	16.7	15	19.2	21	26.9	29	37.2
	部分家人	22	19.0	17	14.7	43	37.1	34	29.3
	全部家人	14	32.6	11	25.6	10	23.3	8	18.6
将来生活地点	城市	14	23.3	22	36.7	9	15.0	15	25.0
	农村	21	23.9	7	8.0	26	29.5	34	38.6
	不清楚	14	15.7	14	15.7	39	43.8	22	24.7
城市生活时间	3 年以下	13	17.6	10	13.5	32	43.2	19	25.7
	4-5 年	14	21.5	9	13.8	25	38.5	17	26.2
	6-7 年	13	27.1	11	22.9	9	18.8	15	31.3
	8 年以上	9	18.0	13	26.0	8	16.0	20	40.0
个人收入	3000 元以下	35	20.2	22	12.4	71	39.9	49	27.5
	3000 元以上	13	22.0	21	35.6	3	5.1	22	37.3

相关分析表明农村认同与城市认同之间是相互独立的($r=0.04$),因此可以以二者为维度进行交叉分类。由于量表为1至6点计分,因此以中点3.5分为标准,分别将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分为高认同组和低认同组,借鉴沃德的方法,区分为四种认同模式,即整合型(高农村认同/高城市认同)、分离型(高农村认同/低城市认同)、同化型(低农村认同/高城市认同)和边缘型(低农村认同/低城市认同)。四种类型的双重认同各自的比例分别为整合型20.7%,分离型31.2%,同化型18.1%,边缘型30.0%, $\chi^2_{(3)}=12.23, p<0.007$ (见表7)。可见,大多数青年城市移民能够获得清晰的身份认同(整合型、同化型和分离型),但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认同模糊的状况。青年城市移民,他们往往从学校直接进入城市,缺少农业生活经历而习惯于城市生活,即便在城市没有工作,他们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更容易产生既不融入城市也不融入农村的“双边不融入”(李强,2009:70),在社会认同方面体现在他们对农村人身份和城市人身份均认同模糊。此外,青年城市移民中分离型与边缘型两种“不适应”认同类型所占比例约三分之二,而整合型与同化型两种“适应”认同类型所占则相对较小,可见青年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是存在且严重的。

不同类别的城市移民在四种认同类型的分布上也有差异(见表7)。较已婚城市移民,未婚者同化模式所占比例较高,而整合和分离模式则较少($\chi^2_{(3)}=14.38, p<0.01$);农转非户口较农业户口的城市移民同化模式有极大增加,而整合和分离模式减少很多($\chi^2_{(3)}=49.59, p<0.001$);较其他两类移民,所有家人一起在城市生活者中整合模式和同化模式较多,而分离模式和边缘模式较少($\chi^2_{(6)}=11.68, p=0.07$);较其他两类移民,将来打算生活在城市的移民中同化模式占比例最大,分离模式占比例最小($\chi^2_{(6)}=31.54, p<0.001$)。个人收入达到每月3000元以上,城市移民中的同化型认同会快速增长,而分离型则急剧减少,同时边缘型认同也会增多($\chi^2_{(3)}=31.85, p<0.001$)。

白领较蓝领移民的同化模式有极大增加,分离模式有很大减少,而边缘模式也有一定的增加($\chi^2_{(3)}=63.43, p<0.001$)。前文分析了户口和工作环境是造成白领和蓝领之间城乡认同差异的原因,认同模式的职业差异也可作此解释。袁晓娇等人(2010:41)研究发现,公立学校留守儿童的同化型认同更多,而分离型认同更少,可见工作学习环境对认同模式的作用是一贯且显著的。

在城市生活时间不同,四种认同模式的分布状况也不同($\chi^2_{(9)}=18.43, p=0.03$),在城市生活六、七年是一个分水岭,6年以后的城市移民同化型认同所占比例出现急剧增多,分离型认同则出现急剧减少,边缘型认同也开始逐步增多;整合型认同的变化轨迹则与其他三种类型认同不同,它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该结果与袁晓娇等人(2010:41)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一致性,他们的研究将进京时间区分为四个阶段(进京0-1年、1-2年、2-5年和5年以上),进京5年以上的流动儿童同化型认同比例增长较多(比例增加14.6%),整合型认同也是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分离型认同的比例则是逐渐减少(后三个阶段比例逐次减少约10%),边缘型认同的比例则减少不明显(比例最多减少3.4%)。可见,城市生活6年左右时间是城乡认同转变的积累爆发阶段。

整合型或同化型两种适应性认同比例增加,而边缘型和分离型两种不适应性认同比例减少或稳定,以此为标准综合考虑各因素的作用,对城市融入最具有影响力的有三项,分别是户口类型、家人居住城市情况和未来的生活地打算;非农户口或全部家人一起生活在同一城市中或未来打算生活在城市中的城市移民,他们的同化型和整合型两种适应性社会认同比例更大,而且分离型和边缘型社会认同较少。其中最有效的因素是“与家人一起在本市生活”这一社会心理因素;跟家人在一起的城市移民,他们不仅有更多的整合型和同化型社会认同,并且有最少的边缘型社会认同。基于该结果,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给城市移民家庭可居住条件来帮助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

五、值得注意的现象

整合性、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四种认同类型中,边缘型认同是在农村认同和城市认同量表

上得分都低的认同类型,该类型的城市移民既没有形成良好的城市身份,也丢失了原有的农村身份,他们处于一种身份模糊的自我迷失状态,他们的幸福感最低,是一种最不健康的社会认同模式(郑雪、David Sang,2003:11-12)。从各因素与边缘型认同的关系中,可以寻找到社会需要去关注的人群。白领城市移民的各种认同类型中,边缘型认同占到了最多的比例(38.6%),而且比蓝领城市移民中边缘型认同比例(23.5%)更高;收入层次中,较之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27.5%),3000元以上的城市移民中有更多的边缘认同者(37.3%);获得城市户口的城市移民中边缘型认同的比例(33.3%)也高于农村户口的城市移民(28.7%)。

当前研究中,研究者们更多关注蓝领城市移民,即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而很少涉及白领城市移民的城市融入情况;更多关注农村户籍城市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而很少涉及取得城市户口的城市移民的城市融入情况。似乎有一种集体潜意识在影响人们,使他们认为:白领、取得城市户口的和较高收入的城市移民,他们的适应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本研究结果却发现,尽管白领、取得城市户口和较高收入的城市移民同化型认同增多,但他们中陷入自我迷茫的比例也在增多。社会适应不应仅仅是制度性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取,它更应是文化心理的融合。获得城市户口、担任管理者的职务、有更高的收入,都不必然能得到文化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冲突。因此,白领和获得城市户籍的移民群体,他们的城市适应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

六、结论

本研究使用心理量表对237名城市移民的农村和城市认同状况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并考察了相关变量与城乡认同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其一,尽管城市移民所感知到的农村评价低于城市评价,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感知更倾向于“农村人”,且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较高而对城市的归属感则低于一般水平。总体上看,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且高于城市认同。

其二,已婚、获得非农户口和白领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较低,而获得非农户口和白领城市移民的城市认同更高。收入较高的城市移民他们的农村认同更低而城市认同更高;全部家人都一起在城市中生活的城市移民,他们的农村认同更低而城市认同更高;未来确定留在城市中的人,他们也有着更高的城市认同和更低的农村认同。

其三,根据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得分高低,将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区分为四种类型,各类型及分布状况为:整合型20.7%,分离型31.2%,同化型18.1%,边缘型30.0%。适应性的整合型与同化型较少,而不适应性的分离型和边缘型较多。因此城市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不甚良好。

其四,婚姻状况、户口状况、职业类型、家人在本市居住与否、未来生活地期望、城市生活时间、个人收入等因素与城乡认同类型有关联。最重要的因素是家人在本市居住与否,全部家人一起在本市生活的城市移民,他们的整合型和同化型城乡认同比例最高,而分离型和边缘型城乡认同比例最低。获得城市户口的、白领、收入较高的青年城市移民,他们同化型认同增多的同时,边缘型认同的比例也在增高。

参考文献:

- 蔡禾、曹志刚,2009,《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9卷第1期。
- 蔡贞、汪玉兰、毕重增,2012,《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的结构与测量》,《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第4期。
- 范兴华、方晓义、刘杨、蔺秀云、袁晓娇,2012,《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的作用》,《心理学报》第44卷第5期。
- 郭星华、李飞,2009,《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人口研究》第6期。

- 郭星华、邢朝国,2009a,《社会认同的内在二维图式——以北京市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为例》,《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2009b,《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中州学刊》第6期。
- 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春、宫秀丽,2006,《自我分类理论概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1卷第3期。
- 李强,2012,《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彭远春,2007,《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第31卷第2期。
- 石长慧,2010,《城市更好:流动少年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偏好》,《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 宋林飞,2005,《城市移民的文化矛盾与社会安全》,《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特纳等,2011,《自我归类论》,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沛、刘峰,2007,《社会认同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认同威胁》,《心理科学进展》第15卷第5期。
- 吴小勇、黄希庭、毕重增、苟娜,2008,《身份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3期。
- 夏四平,2008,《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特点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叶娜,2009,《群体认同的结构与动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袁晓娇、方晓义、刘杨、蔺秀云、邓林园,2010,《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教育研究》第3期。
- 张莹瑞、佐斌,2006,《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第14卷第3期。
- 赵志裕、温静、谭俭邦,2005,《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郑雪、David Sang,2003,《文化融入与中国留学生的适应》,《应用心理学》第9卷第1期。
- 周伟文、侯建华,2010,《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城市化与婚姻的双重困境——S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调查分析》,《社会科学论坛》第18期。
- Cameron, J. E. 2004, "A Three-Factor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Self and Identity*. Vol. 3(3).
- Hogg, M. A. 2000, "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rough Self-categorization: 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
- Hutchison, P., Abrams, D., Gutierrez, R. 2008, "Getting Rid of the Bad O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Identification, Deviant Derogation, and Identity Mainten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4(3).
- Jackson, J. W. 2002, "Intergroup Attitudes as a Functio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Perceived Intergroup Conflict", *Self and Identity*. Vol. 1(1).
- Leach, C. W. Zomeran M. V., Zebel, S. 2008, "Group-Level Self-Definition and Self-Investment: A Hierarchical (Multicomponent) Model of In-Group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5(1).
- Roccas, S. & Brewer, M. B. 2002,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6(2).
- Ward, C. & Rana-Deuba, A. 1999,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Revisited",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30(4).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春玲